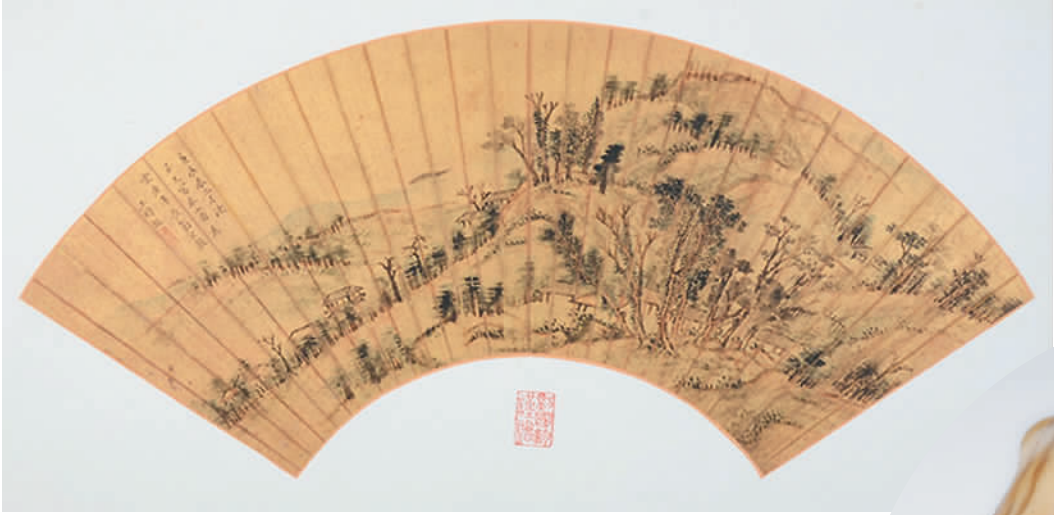


常熟博物馆

虞山风雅 小馆大藏

本报记者 尹晓宇



◀清王时敏山水扇页。  
▼良渚文化双龙连体环形玉佩。  
本文图片均由常熟博物馆提供



“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常熟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隶属江苏省苏州市，山川秀美，文脉悠长。大约7000年前，马家浜文化先民就在此生活，后继有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商代末年，周太王次子仲雍与兄泰伯自渭水流域而来，建立“勾吴”古国，成为吴文化发祥地。春秋时期，言偃北学孔门，被尊为“南方夫子”。明清之际，以常熟虞山命名的虞山琴派、虞山诗派、虞山画派、虞山印派和虞山派藏书名动一时。常熟博物馆坐落在老城区虞山东麓，1997年建成开馆，虽为县级博物馆，但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其馆藏颇具特色。馆内藏有上迄崧泽、良渚文化，下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类文物2万余件（套），其中以书画、陶瓷、玉器三大类为主，藏品数量、等级在全国同级博物馆中名列前茅。

玉中良渚第一龙

良渚文化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最重要的古文化之一，距今约5300年至4200年，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南岸与杭州湾北面之间的太湖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地带，以发达的水利工程、制作精美的玉器而闻名于世。1993年，常熟罗墩村发现一处良渚时期人工堆筑的土墩，是环太湖地区一处重要的良渚文化早期遗址，从中出土了一批玉器、陶器、石器。常熟博物馆玉器厅中有一件珍贵的双龙连体环形玉佩，正是来自罗墩遗址。此玉佩由透闪石质软玉制成，形如小璧，中心孔对钻，留有较明显台痕，通体磨光。在边缘的一侧雕有头向相对的两个龙首，雕琢长度约占整器外缘的二分之一；另一半则自然合为双龙的龙身。全器造型整齐、对称，具有稳重、静穆的艺术效果。这件玉佩是良渚文化中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龙形玉器，有“良渚第一龙”的美誉。

另一件神兽纹玉琮，也是良渚文化的珍品。玉琮出土于常熟庙桥村嘉菱荡良渚文化遗址，距今约4500年。全器通高15.8厘米，长方柱形，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心圆孔对钻，内外磨光。外表四面平整，每面中间皆刻竖槽将其一分为二，并以5条横槽将整面平均分为6节。每节以转角为中轴线，雕刻简化神人兽面纹4组，全器共24组。图案繁缛，布局对称，镌刻线条细微处犹如毫发，其刻工之精，令人赞叹。

玉琮是良渚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属于与神祇崇拜有关的礼器，《周礼》中有



清王翬《芳洲图》轴。

“黄琮礼地”“璧琮以敛尸”的记载。良渚玉琮内圆外方，中为圆孔，方象征地，圆象征天，琮具方圆，象征天地的贯穿。

明清瓷器耀华彩

西晋墓出土青瓷、明清青花和彩瓷是常熟博物馆瓷器收藏的亮点，尤以明清官窑瓷器为最。明正德青花缠枝茶花纹官碗庄重典雅、雍容华贵，属正德官窑中的极品。此碗直口、圆唇、深腹，呈墩子式。釉面滋润肥亮，釉色白中闪青，碗心内饰一折枝茶花，外壁绘缠枝茶花8朵，上下边饰分别为带状如意纹和变体仰莲纹，足底有青花“正德年制”楷书款。据专家介绍，此类口沿较直、腹部宽深、外观庄重而又实用的碗，在宣德时期称为“官碗”，其样式在正德时为官窑器所常用。此碗造型规整，构图严谨，与台湾《明代陶瓷大全》中一件正德青花牡丹纹大碗形制、图案基本相同，但绘制更为精细。其色泽浓艳艳丽，在正德青花中较为少见。清乾隆珐琅彩过枝芙蓉花纹盘是一件令人眼前一亮的艺术品。瓷盘造型规整，胎质致密，施釉温润细腻。在白如霜雪的盘面，以过枝法绘迎风怒放的粉色芙蓉花3朵和含苞待放的花蕾4朵，缓连花朵的是淡绿和深绿的枝叶，花朵上方有一只展翅飞舞的蜻蜓，栩栩如生。盘外绘芙蓉花、花蕾各1朵，间设菊花2朵。瓷盘绘画着色交替使用珐琅彩和粉彩两种颜料，粉彩因有玻璃白打底晕染，使花瓣呈现出薄而艳丽、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而珐琅彩由于彩料较厚，有堆料凸起的感觉，更增加了花蕊的立体感。

珐琅彩瓷器创始于清康熙年间，多为杯盘、壶瓶等小件，专供皇帝、妃嫔玩赏和一些宗教、祭礼活动之用，其最大的特点是使用进口珐琅彩原料，以西洋油画技法在瓷器上绘制图案。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制作趋于精进，所用瓷胎绝大多数为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后送到清宫，由宫廷画家绘图后二次烘烧而成。乾隆前期珐琅彩瓷在雍正的基础上继续烧造，后因乾隆偏爱景泰蓝而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这件瓷盘即为此时产品，其瓷胎仍为造办处库存的上等白瓷，而绘画着色则采用珐琅彩和粉彩两种颜料。由于嘉庆朝很少见到珐琅彩瓷器，故此盘对于研究其工艺的转变和衰落有重要价值。

“四王”山水韵悠长

明清书画是常熟博物馆藏品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清初，江南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并称“四王”，其山水画对清代画坛影响颇深。常熟博物馆收藏多件“四王”作品，其中，王时敏《仿古山水》册、王翬《芳洲图》轴最负盛名。王时敏为江苏太仓人，清初“四王”之首。其所作《仿古山水》册共十开，四开设色，六开水墨。其中仿董源、巨然、赵大年、赵伯驹、米芾、赵孟頫、倪雲林、吴镇各一开，仿黄公望二开。构图稳重，落笔沉着，色彩明丽，气韵温润苍古。虽为仿宋元各家山水，亦有作者自己的风貌。王翬为常熟人，“虞山画派”鼻祖。《芳洲图》是王翬76岁时为好友许天锦（号芳洲）所作。此图绢本，青绿设色，纵185厘米，宽84.5厘米，画面布局恢弘，构图严谨。前景绘大树三株，夹江掩映，其下一舟横渡，群雁争飞。中景为一组村舍景物，错落有致，意境悠然。其上群

峰屹立，层层推远。全图动静结合，气势连贯，用笔水墨滋华，精纯熟练，充分体现了王翬的艺术造诣。

明清时期，江南富庶，收藏成为当地的时尚。常州古里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为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自乾隆时的瞿绍基起，即收藏古籍善本、金石古玩，其后代代相沿，成为史上少有的五世收藏之家，收藏总量达数千件。王翬《芳洲图》轴便是出自其中，1982年由第五代楼主瞿凤起捐赠家乡。

楞严孤本世稀有

晚清翁家是常熟的望族，为常熟官宦家族收藏的代表，其中以同治和光绪帝师翁同龢的收藏最著。常熟博物馆有一套元写本《楞严经》，为翁同龢旧藏，孤本，2008年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经书现存6卷，每卷1册，分为两函。封面中间书写经名，底部书“元僧世珠手录”和“嘉定胡微珍藏”，旁侧绘“双龙戏珠”和“莲花盛开”图案。首册经书的开卷页上绘有礼佛图。封面图文和礼佛图俱用金粉书绘，内页经文则用银粉书写，字迹端庄秀美。经书上有许多处翁同龢的题跋和印鉴。据翁同龢文稿记载，此佛经系元代吴江永兴禅寺僧世珠抄录。清初，经书为嘉定人胡微所得，因仅存6卷，请书法家抄录并精心装裱。光绪年间，经书辗转至北京为翁同龢所得。身为书法家的翁同龢极为推重此经：“山僧笔势妙翩翩，定于吴兴证墨禅。……此唐人写经正轨，参以鸥波笔法，遂尔洒然。”他将经书送往常熟三峰寺收存，后又转为常熟宝岩寺收藏。1957年，宝岩寺僧含晖将其捐出。近年来，常熟博物馆致力于打造精品展览，2017年“山水清晖——虞山画派精品特展”、2018年“万里江海通——江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特展”等取得良好反响，2019年在日本长崎举办“风雅江南——常熟博物馆藏文房珍玩展”，受到日本观众欢迎。

常熟博物馆馆长谢金飞表示，作为长三角地区唯一的县级国家一级博物馆，未来，常熟博物馆将积极推动新馆建设，着力体现地域特色，使博物馆成为公众向往的“历史教育场所、知识学习场所、艺术享受场所、娱乐休闲场所和素质培养场所”。



清乾隆珐琅彩过枝芙蓉花纹瓷盘。

“历观史记英雄将，谁似云长白马功？”千百年来，关公的忠义仁勇精神薪火相传，关公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近日，“天下云长——关公文化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幕。展览汇集山西、河南、甘肃、安徽、重庆5省市9家文博单位的文物精品130余件（组），力求全面展示关公文化及其当代意义。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山西解州人，汉末三国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其忠义仁勇精神备受尊崇，“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此次展览由山西博物院与关公文化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举办，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从历史的角度展现关公荡气回肠的人生经历。第二单元从精神层面阐释关公忠、义、仁、勇、礼、智、信的优秀品格。第三单元从文化层面反映关公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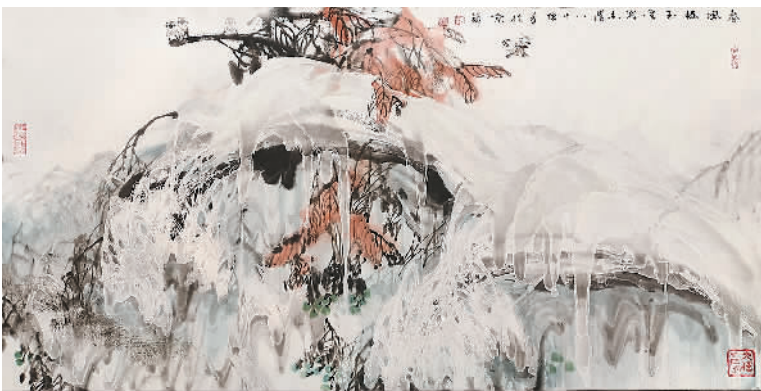
在展览中，可以看到各种关公形象，有提着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的，有手握书卷英姿飒爽的，有轻抚长须巍然静坐的，但有一尊来自运城解州关帝祖庙的关公卧像，却是前所未见。它展现的是关公休息时的样子，身穿便装，侧卧于床榻上，神情也略微放松，但眉宇之间仍英气十足。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卫龙介绍，关公像一般以坐像和立像出现，这尊元代关公卧像世所罕见，为国家一级文物，此次是其首度公开展出。明万历年间的关娘娘持笏板铜坐像也是首次公开亮相，这是当今独一无二的关娘娘坐像。据传，关羽远走他乡之后，关夫人在中条山采药为生，被后人尊称为“药娘娘”。一块黑底金字的“普济商民”匾额格外引人注目。此匾原挂于解州关帝庙内午门东次间，为昆裕德、裕厚泰、庆泰和、天德元等18个晋商商号于1931年敬奉。匾文为书法家张鹏翼早年所书，匾额边框四周饰贴金和彩绘“连升三级”“五富五泰”“琴棋书画”“八仙”等吉祥图案。为配合此次展览，山西博物院还将推出精彩纷呈的公众教育活动及文创产品。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2月27日。



明彩绘关公铜坐像。

山西博物院供图

国博展出当代国画名家作品



于志学《春风摇玉雪松》。

国家博物馆供图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美术学院主办的“知行墨境——当代中国画家邀请展”近日在国博开幕。展览遴选38位画家近百件作品，较为全面地展示当代中国画家家的创作成果，表现了艺术家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研究中国画语言风格与时代特色的艺术实践历程。策展人介绍，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100余年里，以水墨为媒介的中国画发生了从“文人画”到“文人画”的现代化转型。进入新世纪，中国画一方面继续以探索中国艺术精神为主旨，追求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统一；另一方面更加广泛地拓展水墨表现的边界，呈现出探索深入、多样并进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行墨境”展应运而生。从这些题材新颖、手法各异的画作中，可以看到画家们对新时代中国画如何发展的思考，感受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